

敦煌遗书保护与“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

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工作开始于1910年劫余遗书入馆之后，近一百年来，本馆许多同仁都为之奉献了青春。我在《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合订本前言上曾经谈到本馆敦煌文献的收集整理具备了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敦煌遗书入藏的1910年正是京师图书馆刚成立不久，对其整理和研究贯穿整个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二、敦煌遗书在入藏前后颠沛流离的经历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三、由于敦煌遗书的入藏，本馆内外集聚了许多大师级人物，他们爬梳整理，钩沉搜佚，贡献了许多不朽的学术著作。通过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建立起来的图书馆与学界的密切交往，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以至有些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脉络的学者要专门对国家图书馆馆史进行研究，而敦煌遗书整理研究专题正是其契合点。

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保护修复一开始并不象整理研究那样为人所瞩目，这主要是因为敦煌遗书在民国战乱中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秘密封存的状态，在1950年运回北京后也长期保存在几十个战备木箱中，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和修复。1990年前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出版项目上马，大规模的整修和保护工作才从此拉开了序幕。如今，敦煌遗书的修复保护已经走过了悠悠15个岁月。这15年的保护修复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修复原则的确定和大规模修复工作的开展；二、出版、数字化和保存环境改善；三、由经验向科学的过渡——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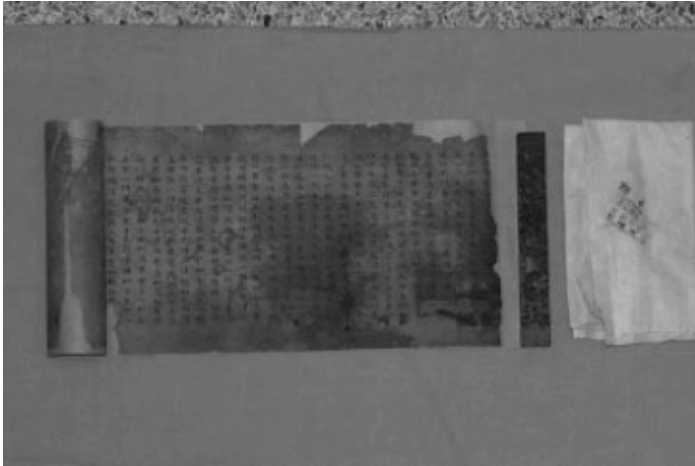
一、修复原则的确定和大规模修复工作的开展

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图书馆的修复人员开始进行敦煌遗书修复的探索，这个探索是由文献学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修复人员共同进行的。经过多次修复试验，确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修复原则和方法，并由方广锴¹、杜伟生²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 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冀淑英在整修敦煌遗书时最早提出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要求在整治敦煌遗书时突出重点，抢救那些影响遗书寿命的、必须修整的地方，对破损不严重的地方尽量不动，以保持古籍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受损失。这一原则也符合古人所谓“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告诫，避免因修手不佳造成新的损失。

2. 整旧如旧：“整旧如旧”的方式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中就有过表述。赵万里在五十年代初修复《赵城金藏》时建议采用这种方法，他说：“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³《赵城金藏》的修复体现了这个可贵的原则，不再采用字画装裱的方法，而是通卷粘补一层褙纸，利用原来的轴杆卷起来，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因为《赵城金藏》在战争年代的转运过程中受到损坏，三分之二的卷子严重发霉变质，粘补一层褙纸的办法是可行的，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但《赵城金藏》的修复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说更换弯曲的轴杆、更换褙纸和裁减天头地脚的办法都还是沿用传统的修复技法，对原始文献有损害。⁴有鉴于此，在修复敦煌遗书时提出了不进行整卷托裱的方法，只是在必须要抢救的地方进行修补，补纸轻微搭在卷子破损的地方，以起到保护的作用。虽然不必通卷托裱，但仍然在没有轴杆的卷子上加了新轴，以保证敦煌遗书不会受到自身重力的影响发生断裂损坏；同时用乾隆高丽纸衬底，将卷子虚卷起来，最大限度地保护敦煌遗书。这种方法是“整旧如旧”原则的最好体现，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敦煌遗书的原貌，同时又对影响遗书寿命的地方进行了抢救。修复人员在修复实践中还认识到，所谓“整旧如旧”不能片面理解为一定要恢复到某年代的原始面貌，在一定意义上，最好是保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状态不再改变。因为敦煌遗书原卷上一切信息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即使后人的加工让原卷发生了变化也要尽可能地保留，因为这有

可能为我们进行其他的研究提供借鉴。胡玉清对国家图书馆藏潜 9 号敦煌遗书的处理就反映了



对这一修复原则的灵活运用（见图）。在这个敦煌遗书上，有些断裂破损处被古人用细麻绳做了连接。糟朽的麻绳根本起不到保护原卷的作用，反而会影响原卷保存的寿命。但麻绳连接破损的现象是古人修补遗书留存下来的，是历史信息，所以修复人员在处理原卷时既保存了麻绳连接遗书的原貌，又用补纸修复了断裂破损之处。修复人员还发现人们在拉开遗书时，手要用力把住或剥开卷端，即使是用力很小，也会使残破的卷端造成

新的断裂和破损，所以利用加长的补纸做了一个完整的卷端，使遗书在利用时舒卷自如，又不影响原卷的原始面貌，这些处理方法都真正理解了“整旧如旧”的原则。大英图书馆收藏的 S. 6349 唐咸通写本《周易三备》在修复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比如对待遗书背面前人修补时粘贴的横七竖八的纸条要尽可能地保存下来，有些压住了文字的纸条可以在修复时轻揭下来进行拍照和录文，在把纸条粘回去，对于破损的卷断可以用接纸的办法使其不会继续损坏。特别要注意的是，《周易三备》中的《中备》与《下备》两部分是不同时期抄写的，存在着错乱，反映了写本时代书籍传播不固定的特点，而且还保存了今天被有些学者称为“旋风装”的独一无二的装帧形式，为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佐证。如果人为地调整前后内容，或改变原有的装帧形式，可能就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研究范例。

3. 可逆修复：中国传统修复方法很多都没有考虑到可逆性，比如目前国家图书馆保存的 1675 部宋元善本，大部分都由后人做了改装，由蝴蝶装和包背装变成了线装，有些还被裁去了天头地脚，使我们失去了研究古代书籍独特装帧形式的可能。民国间流落到民间的一些敦煌遗书采用字画装裱的办法，虽然美观，但遗书用加矾的浆糊与硬度很大的褙纸裱在一起增加了原卷的酸性和断裂折损的可能，也使学者们无法了解原卷纸背的信息。近几年，李济宁和杜伟生对各时代敦煌遗书用纸的厚度进行测量，发现从 5 世纪到 8 世纪，中国古纸越造越薄，韧度越来越强，体现出造纸技术的发展特点。敦煌遗书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系统的中国古纸，对造纸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所以保持敦煌遗书原貌非常重要。即使是在必须抢救的地方进行修补，也要做到可逆，避免使用通卷托裱的方法。西方曾经在修复时使用过化学胶水，或用加膜加网等不可逆的方法进行修复，自己称为“善意的破坏”。近年来，纳米镀膜技术在纸质文献的修复上得到应用，它的原理是用纳米级纤维填补纸中的细孔，以达到增加纸张强度的作用，但也由此改变了纸张的性质，是一种不可逆的修复。虽然这种修复方式能否应用于近现代文献修复尚在研究中，但绝对不可以用来处理像敦煌遗书这样的珍贵文献。另外，修补在细节上也要特别注意，使用的补纸在颜色上要与原纸区别开来，以不干扰后人的研究。

从 90 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已经修复完成了 5000 米敦煌遗书，占全部遗书的将近一半，在处理细节的技术方法上不断进步，没有出现破坏性的修复，这是值得庆幸的，是一个很大的功绩。在操作管理上，善本部进行了严格的要求，在试验技术未达到满意的状态下不冒险进行修复，不作破坏纸张和装帧形式的修复，重视在修复前对纸张性能和成分进行必要的检测，重视由修复人员和研究人员集体制订修复方案，避免造成大的损失。国家图书馆很重视学界和修复界共同对敦煌遗书修复进行的探讨。2001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中国善本特藏保存保护学术研讨会”，各国人士针对敦煌遗书修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有的学者提到过去用加网加膜方法进行的敦煌遗书修复早已摒弃不用了。但各国的修复从修复方法和用料上还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对原卷（即使是严重毁坏的原卷）完全不动的原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2003 年，在“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数字化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同

仁在敦煌遗书修复的原则、方法和材料选择的讨论上出现高度的一致，采用中国传统手工纸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国家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注重引导民众参与敦煌遗书的修复事业。从2003年4月起，国家图书馆每年推出一批破损严重的敦煌文献，开展“全民参与，共护国宝”的活动，征求民众的捐款。捐款数只占修复款的很少一部分，但这个活动拉近了普通民众与国宝之间的距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拿出的敦煌遗书都在很短的时间被认捐一空。善本特藏部在完成修复后会专门举办一个修复展览，并向认捐者颁发证书。

二、出版、数字化和保存环境的改善

在修复敦煌遗书的同时，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加紧进行敦煌遗书的影印出版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任继愈、方广钊就组织善本部敦煌遗书整理的骨干力量进行《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纂工作。编纂工作有定名、编目、撰写叙录、提要和定稿等诸多工作。由于敦煌遗书数量庞大，这个工作持续了15年之久，在此过程中因为经费和人员短缺数度停顿。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全部敦煌遗书的定名、编目工作，还完成了近2000万字的提要撰写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拍摄和最终校对定稿，预计2007年最终完成全部馆藏敦煌遗书的出版工作。

200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正式达成了合作开展国际敦煌项目的协议，应当说，这个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项目采取了非常完满的方式解决各自所藏文献的权利，是一个国际合作的范例。国际敦煌项目所倡导的“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宗旨立意高远，它以敦煌遗书数字化揭示（包括研究文献的揭示）为手段，兼顾了对敦煌遗书修复和保护环境的改善，以达到敦煌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它第一次实现了世界范围内敦煌界的图书馆员、修复人员和学者集合在一面旗帜下，有计划地进行业务和学术交流，令人振奋。IDP把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作为归宿，也是各国同仁的共同目标。IDP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由魏泓博士直接领导，已经在数字化、保护、出版、展览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令人赞叹。这个项目2002年开通中文网站后，目前已经上网书目数据10773条，写卷600余件，图像6300多拍，学者档案信息400余条，编辑4期敦煌学通讯。近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制作了敦煌文献研究索引近4万条。中文IDP网站除向读者提供原卷影像外，是一个包括敦煌遗书联合目录、论文论著索引、学者库和学者动态的综合网站，它不但可以有效整合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的研究整理成果，而且可以带动该机构成为中国敦煌学的信息中心。在IDP工作开始之初，大英图书馆的秦思源（COLIN CHINNER）即在编目软件上设计了一个修复档案窗口，以促进敦煌遗书在拍摄前的修复和保护，这种对敦煌遗书严谨负责的精神值得高度赞许。后来高奕睿（IMMRE）编制了一个敦煌字库软件，可以对敦煌遗书电子文本的字进行拆分和归类，这种研究已经是在敦煌遗书数字化基础上进行了，这是IDP项目所产生的成果。高奕睿、林世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的创立与前景》一文中提到“以国际敦煌学项目为契机，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数据信息中心，提高国家图书馆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国家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支持国际敦煌学项目的发展，使两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⁵的指导思想非常可行，这个设想把除原文数字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数据库”结构分为中国各机构所藏敦煌文献联合目录、研究论著目录、敦煌吐鲁番学者档案数据库和敦煌文字数据库等几个部分勾勒了敦煌遗书数据体系的面貌，可以作为敦煌资料数字化今后发展方向的参考。“目前国际敦煌项目在网络上展示的敦煌原卷图像是彩色的，与原卷一样逼真，项目使用了专门设计的4D数据库，用精密的PHASE1数码扫描设备将敦煌写卷制成高清晰图像。图像放大后，可以观察到用普通放大镜不易观察到的字的细部、墨的层次、纸张的纤维等，这些都是出版品所不具备的。学者拥有这两方面的便利条件，使得查阅敦煌文献既不必再受舟车劳顿之苦，也无需接触珍贵又容易损坏的原卷，解决了保护与研究的矛盾。”⁶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保护还体现在保存环境的改善上。2002年，财政部直接下达了350万元专款用于敦煌遗书新库房的建设，这项工程到2004年完工，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在此之前，敦煌遗书被保存在几十个木箱中，这些木箱还都是30年代敦煌遗书转移到上海时所用，

放置十分拥挤，不便于利用。新库房完全改变了这一面貌，144个楠木书柜，每个楠木柜可以放置120个尺寸一致的楠木卷盒。卷盒采用中国传统的燕尾暗榫，底板采用樟木，以起到防虫作用。卷盒中设计了木轴和木凹槽，以便对修复后的敦煌遗书妥善保存。因为卷盒的空间很大，不用的包袱纸、线绳、标签等可以放置在底部，起到了原盒保存过去档案的作用。对于特别大的卷子又制作了特制的卷盒进行保存，残片则用纸册来保存。新库房建成后，敦煌遗书在恒温恒湿、避光防虫的环境中保存，起到了最佳的保护效果。

三、由经验向科学的过渡——“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实施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和修复正在经历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阶段。经验修复一直是古籍修复工作的主流，使多年总结出来的古老修复传统得以传播和延续。传统修复采用“师带徒”的方式，很便于在修复实践中传授修复技艺，对于学习者提高自身水平很有帮助。

但我们也看到，目前在中国，古籍保护远远落后于档案保护和文物保护，中国尚未建立文献修复和保护的国家中心，也没有设备先进的文献修复车间，这对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国来说的确是很不相宜的。据统计，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难以完成庞大的古籍修复工作。古籍修复人才还存在着综合素质低（全部都是大专以下文化水平）、职称低（几乎没有高级职称）、员工年龄大（40岁以下不足1/6）等情况。有些古籍修复人才虽然技艺高，但文化水平低，难以总结经验，对与古籍修复相关的文献学，以及生物、物理、化学等知识也了解甚少，限制了进一步发展。国内教育系统目前没有开设古籍修复课程和专业，修复行业还基本停留在手工和经验传授的阶段，没有把古籍修复和保护从传统技艺上升到理论和科学的层面。修复界对文献对象的认识还不透彻，许多保护理念和方法还不科学。在这方面，英国国家图书馆早就编纂了《英国国家图书馆保护科学丛书》三卷，第一卷《敦煌和吐鲁番：中亚古文献的内容及其保护》对古代文献的脱酸处理以防止揭下衬纸时颜色退化、纸质写卷保护中醋酸纤维素的影响、对敦煌写本中黄色颜料进行化学分析的新技术进行探讨；第二卷《小檗碱和黄堇：古代的著色剂和染料》则详细研究了与保护有关的小檗碱的化学成份，记录了它的光谱特性和色谱离析，尤其着重考察染料和被染物中的小檗碱。第三卷《敦煌伪卷》通过分析书法、文字的使用、染料和纸张纤维的化学测定等方法来判别伪卷。⁷这些研究成果都借助先进设备和科学方法对敦煌遗书的修复和保护进行研究，非常值得借鉴。而中国拥有这样大量而系统的古纸，对纸张的认识，对古代保护文献方法的认识还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难以进行科学的检测和研究，这是很不应该的。

为从根本上解决古籍保护和修复行业面临的人才短缺、设备陈旧、方法落后、大量古籍难以得到保护修复的状况，文化部计划开展“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这个项目的第一期计划在10到15年内完成以下工作任务：

1. 制订古籍保护和修复的相关标准规范；
2. 开展全国古籍文献数量暨保存保护状况普查和定级工作，摸清家底；
3. 修复一批珍贵古籍善本、金石拓本、舆地图、少数民族古籍、名家手稿等文献并制作装具；
4. 在国家图书馆建设“古籍特藏修复保护国家中心”；
5. 开展联合办学，分层次培养古籍修复保护人才；
6. 在重点古籍书库安装温湿度监测设备，进行定期检测；并对有害气体进行定期检测；
7. 评选“国家珍贵古籍特藏书库”，以国家资金带动地方资金，加快国家图书馆和全国珍贵古籍特藏书库的建设；
8. 对濒危珍贵文献进行数字化或抢救性出版。

“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几个部分是相辅相成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古籍保护和修复目前的薄弱和落后状况。其中制订古籍保护和修复的标准规范是一切保护工作的基础（目前拟订的标准主要有《古籍特藏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古籍特藏书库典藏标准》、《古籍特藏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古籍特藏普查工作规范》、《古籍特藏修复人员任

职业资格》等。这些标准的制订将对中国古籍保护和修复行业起到规范作用，对敦煌遗书保护和修复工作也将起到有益的作用；人才培养是进行保护工作的保障；普查、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于要保护的文献现存状况和如何开展保护工作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而一切工作都必须归结到切实的修复工作和保护环境的改善上来，通过扎实的工作挽救古代文明的成果。

对濒危珍贵文献进行数字化或抢救性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敦煌遗书经过历史岁月的磨难大都已经残破，有些出现了断裂的危险情形，这种断裂即使只是一个字的丢失，也会有巨大影响。比如S6349 唐咸通写本《周易三备》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在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的图版上，第二纸正面的《中备》“需”、“比”两卦和背面的“谦”卦都是残缺不全的。但在本馆所藏40年代王重民先生所摄的大英图书馆敦煌遗书照片中，上面三卦的地方虽然可以看出纸张即将断裂的痕迹，还基本还是完整的，比现在看到的图版多出半个手掌大小的一张纸，正背两面多出65字，其中就有伪托孔子弟子子夏所述的筮辞。荣新江教授在《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一文中也曾提到德国的吐鲁番文书残卷赖王重民先生拍摄得以保存原始面貌的情况，他说：“笔者赴德前，曾详细调查收集前人有关柏林吐鲁番汉文文献的研究成果，有幸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些王重民先生于二战前从德国摄回的照片，计21张（除去重复），……周祖谟《唐五代韵书辑存》曾发表了其中的韵书资料。这些旧照片只有考古学编号，长时间没人注意。这次在柏林，笔者查出了大部分照片的新编号，重新确认了这些照片的价值。有些照片所摄的残卷，现已不知所在；还有3张照片所示的卷子，比原卷多少不等地长出了一截，如Ch/U.6782d《一切经音义》写本，现仅存6行文字的上半，但照片不仅有其下半，还有前后48行文字，现已残失。”⁸这种古纸即将断裂的状况在敦煌遗书中当不少见，在后人翻看、研究的时候更不断会发生散落的情况，说明了敦煌遗书亟待抢救修复的紧迫性；从40年代王重民、向达先生在法国所作的拍摄工作，我们在今天才有幸看到许多虽然被图书馆收藏，但在阅览中不断残破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原始面貌，也说明了现在尽快进行数字化或出版工作、保存原卷影像是多么必要。

李致忠先生曾经把古代文化典籍的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两个方面。⁹所谓“原生性保护”就是以长久保存文化典籍的原生形态为主要目的的保护，包括保存环境的改善、装具的制作和破损典籍的修复。“再生性保护”是以整理、研究、出版、数字化等方式的保护，是以传播作为保护的方式。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勾画了一个大保护的轮廓，把保护的科学理念和技术方法纳入其中，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典籍保护开阔了思维空间，这也是“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指导原则。

敦煌遗书的修复和保护是“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受益者，和国际敦煌项目构成了“双保险”，是所有立志保护古代典籍同仁的好消息，我们有理由为珍贵文献光明的未来而欢呼。

注：

1. 方广锜.《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前言.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 杜伟生《敦煌遗书的修复》
3. 赵万里.在《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上的发言.北京图书馆档案文献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 杜伟生.《赵城金藏》修复工作始末.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第3期
5. 高奕睿 林世田.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的创立与前景
6. 同上
7. Susan Whitfield 著.林世田编译.数字敦煌泽被学林——纪念国际敦煌项目（IDP）成立十周年
8.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
9. 张立行.古籍保护应两性并重.文汇报,2003.8.13